



## 夏日思考冬日的落叶

★丁海明

词语寄居在思想的树枝上  
百鸟失语  
夜幕降临  
音乐潜伏  
宫商角徵羽迈着戴着镣铐的脚步  
与一位饮者翩翩起舞  
落叶，随时准备重生前的枯萎  
死去的叶片，若有人祭奠，或者被风歌颂  
就会复活，振翅如蝴蝶

夏天如此闷热  
一场雨从昨晚开始下个不停  
土里的辣椒苗正在疯长  
想象着 六月份或者七月份的某天  
我梦里又路过朋友的庄园  
他指着埋在土窖的空酒瓶  
诡谲地对我似笑非笑

我知道：像落叶蝶变一样  
夏天的热烈  
也会在秋季  
结出硕果  
让我酩酊又醉

## 舵手

★刘理鸿

海水汹涌澎湃，  
海风被踩在脚底。  
任凭狂风暴雨肆虐，  
船只沉入深渊。

谷浪被掀起，  
船只骑在浪尖上。  
舀去灌入船舱的海水，  
一次次破浪前行。

舵手掌握全船生死，  
岛屿在海中屹立不倒。  
绿草茂盛风疾草动，  
船只视岸如浮萍，无法靠近。

左手生机，右手命脉，  
方向盘掌控着生命。  
暴风雨中飞燕穿梭，  
肆虐风中闪现金光。

## 五月,想起父亲

★残苑

面对黄土，我背朝天，显得如此渺小，  
如撒向空中的一粒草籽。  
然而聚沙成塔，渺小者亦能成就非凡，  
这片纯朴的黄土地，种下五月的深情。

泥土、盐滩，岩石、高楼，  
良田和亲密的伙伴，  
一同承载着父亲的亡灵。  
禾苗破土而出，绿意盎然，长势喜人。

五月里，忆起父亲挑起大梁的身影，  
他向大地鞠躬，收镰的那一刻，  
我仿佛看见土地被汗水染红，  
传统的模式逐渐远去。

父亲啊，你在思索什么？  
你用我残了四指的手，紧握笔耕，  
地已成垄，稻已成行，路已成形，  
还期待怎样的希望，让我们再努力一把。

## 变压箱

★项紫薇

太阳是馈赠吗？

自从我看到电线穿过指缝，  
先架上扶梯，  
再戴上黄色安全帽，  
一步步往左挪动，  
仅是零点几米的跨度，  
便能拆检与更换变压器。

然后，静听夕阳坠落的声响。

于是我坚信，  
星星终会璀璨绽放。

当人们疲惫不堪，  
当编外修理工仍忙碌不息，  
阳光越发炙热。

## 舒幼民/文

一觉醒来，心中五味杂陈，我梦到了队长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国农村以生产大队为基本单元，大队隶属于公社，下面再分若干小队。我梦见的，正是生产小队的小队长。

当年，我尚算城里人，高中毕业后，响应号召上山下乡，到农村去锻炼。1975年7月30日，我满怀激情地来到了温岭县城南区大闾公社长沙大队插队落户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那年，我17岁。与如今学生的实践体验不同，我们当时是把户口迁到农村，成了真正的农民。

我被分配到第六生产小队。午饭后，住处还未安顿好，小队长就领着我下了田。正值夏收夏种，田里农活繁忙，哪有时间多啰唆。那时，农村以生产小队为基本单元进行劳作，统一出工，统一收工，按劳动能力和年龄记工分。壮劳力记10工分，老弱病残和妇女则根据实际情况，在5至10分之间评定。

去田里的路上，我与队长相识。他不到50岁，但因长年农事操劳，显得苍老许多。他皮肤黧黑，透着农民特有的古铜色，性格爽朗，健谈。他告诉我，城里学生来农村做农事，户口都迁过来了，不是一两天的事，苦头还在后头。我说我们是响应号召，来接受再教育的。我还记得自己说了一句，希望队长多教我怎么做农活。队长说，做事要用心看，出力不能偷懒。到了队里就是队里的人，有事他会说的。就这样，我这个懵懂少年开始了农村生活。队长先安排我割稻，这是最基本的农活。他递给我一把稻镰，我下到田里，半只脚陷入泥水，拔脚走路都难，摇摇晃晃的。队里的男女老少见了都笑。队长一瞪眼，说有什么好笑的，你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人家是城里来的，第一次下田，帮帮忙。队长手把手教我拿稻镰，告诉我割的时候要往下割，不能往上提，这样不容易割到手。割下的稻子怎么拿也有讲究，先用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拿着，再用无名指、小指拿，这样就能拿得多。割下的稻子要码放到身后田里，归拢后再用打稻机脱谷。说是打稻机，其实就是用脚踩的脱壳机。脱壳后，再把稻秆缠绕成“人”字形，放田头晒干，带回去按人头分。

就这样，我融入了这群农民中。割稻的活相对简单，一下午下来，我就比较熟练了。夏日天长，到了下午三四点钟，农民朋友们通常会饿，这时家里的女人会送来点心。我们单身汉没人送吃的，队长就把他的一份点心匀出一点给我。我不好推辞，拿起一只粗碗，从队长碗里匀来半碗番薯丝饭和咸菜，吃起来特别香。那年代就这条件，没人见外。

等到这片田里的稻子割完，已是傍晚八点半了，天才渐渐黑下来。收工整理好农具回到队里，还要评工分。其他人的工分早已评定，就我一个新来的。大家七嘴八舌，有人说刚来的小后生按半劳力算，评5

## 江文辉/文

人说闺女是父亲的小棉袄，是父亲追逐诗与远方的源泉，是化解愁绪与不甘的良药，也是感念爱与牵挂的宝藏。我的两个闺女也不例外，回望她们的成长历程，无论是咿呀学语、蹒跚学步，还是快乐奔跑、走进校园，都让我感到无比幸福。

两个闺女年龄相差六七岁。大闺女已到了小升初的年纪，她的性格、做事方式、待人接物与尚在读幼儿园的小闺女大相径庭。因此，我对大闺女尤为关注。

我平日里忙碌异常，一周里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人们常说“工作狂”会失去很多，我确实失去了大闺女成长的许多记忆。

近两年，我觉得大闺女变化很大，变得异常文静、温和，逢人总是微微一笑，从不多说废话。对我的宠溺，她似乎有些“厌倦”，总表现出一副不那么腻歪的样子。

事业中，我磕磕碰碰，今年这个本命年更甚。正因如此，大闺女儿时的点滴印象总能冲破我的记忆，让我回味无穷，甚至在梦中惊醒。

我的成长环境比同龄人艰苦得多。所以，当大闺女走进我的世界时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她的未来绝不能走我的“老路”。为此，我拼命工作，把自己熬得几乎认不出自己。

小时候的大闺女很懂事。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时，她总会飞奔到我怀里，摸摸我的胡茬儿，或亲亲我的双颊。有一次，她发现我不对劲，快速拿来剃须刀，双眉紧锁地质问我：“爸爸，你今天出门是

分。队长见状发话，说刚来是刚来的，但人家也是堂堂一个后生，5分少了点，7分如何？见队长发话，大家都说好。要知道，那年代的工分，大家都是斤斤计较的。一年下来，刨去口粮钱，年景好，一工（10分）能分八九角，几工分就要做出几工分的活。就凭队长的这句话，我也要尽力做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早出晚归，队长多加关照，成了我依赖的人。队长家离队部不远，我没事就往他家跑。刚开始做农活时，大家都抱着晒黑皮肤炼红心的决心。火辣辣的太阳当头照，我们穿着背心裤衩下田，连箬帽也不戴。几天下来，全身都脱了几层皮。队长见状忙劝道，小年轻不懂当头太阳的厉害，箬帽还是要戴的，长衣长裤还是要穿的，挽起裤脚、撸起袖子就好了。做农活不能一时逞能，而是一辈子的事，要懂得身体要紧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队长的谆谆教诲中体现着父母般的关爱。队长还送给我一顶箬帽遮阳用。一轮夏收夏种下来，在队长的点拨下，基本的农活我都学会了，比如割稻、拔秧、插秧、摸田、耙田、车水、担稻谷、捆稻秆等。连农家猪圈里挖猪粪，我赤着脚一下子就跳进去了。队长见了既高兴又心疼，跟别人说起，城里的后生能做到这份儿上，真好用。到了下乡的第二个年头，队长提出把我的工分从7分调到8分，并让我到他家搭伙。要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农家生活都很艰难，多一双筷子就多一张嘴。想起这些，我心头至今都热乎乎的。我把小队分来的谷子、豆子等都交到了队长家中，俨然和他成了一家子人。那年代日用品奇缺，我每次回家都尽量从家里匀出一点肥皂、火柴、电池等送给队长。队长的儿子那时在读小学，我送给他几本练习本，他高兴极了。

就这样，我在生产小队渐渐成长起来，在队长家中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。吃饭时，面对成群的蚊子、苍蝇和灶间猪圈的气味，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；农家的被褥床铺有很多跳蚤，我也能安睡；雨天时，我也能跟农民朋友在队部小店打上一碗酒，就着几粒炒豆喝上几口。特别是我的农活有了很大起色，像犁田、育秧、看庄稼长势、观天象等“高难度”技术农活，我也能上手了。业余时间，我放下了其他的梦，唯独放不下懵懂少年时的文学梦。我对随身带到生产队的文学书籍爱不释手，像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雷雨》等，都是我的心头所爱。那些被烈日晒卷边的书页里，总夹着几粒稻壳，像队长藏在皱纹里的笑。

读了书，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和人分享。在队长家吃饭时，我常常讲给他上小学的儿子听。高尔基、保尔·柯察金、萧长春、杨子荣等，都有可讲的故事。在田间地头休息时，我把这些书中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大家都听得竖起耳朵。队长说，我肚里墨水蛮多。我答，搓麻将我认不全牌，打扑克顺子也排不来，剩下的就是看点书了。我学着写了几篇小说投给报社，但都没有下文。后来给本县的广播站投新闻

## 旋转裙摆上的年轮

不是忘了剃胡子？”

我愣住了，等待着“惩罚”。大闺女命令我蹲下来，细心地给我剃着胡子，像小大人似的叮嘱我：“爸爸是家里的顶梁柱，要讲门面，爱干净，别给我丢脸！”

简单的话语，却让我乐得倦意全消。后来，在与老婆的交流中，我觉得大闺女长大了，自动升级成了小棉袄，暖着我的心。

随后，大闺女又钟爱我做头部SPA，动辄挤黑头、搽面霜。我知道，她开始爱美了，把我当作“实验品”。但我乐在其中，毕竟这是她懂事的另一种表达方式。

可近两年，这些“压制”我的动作却越来越少了，不知何时起，干脆就消失了。难道她这个小棉袄功能失效了？还是她真的不懂事了？

之前，我无意中听老婆叮嘱大闺女出门要穿内衣。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大闺女就这样长大了？

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与大闺女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她埋头于学业和舞蹈艺术，每周都排得满满的。

有一次，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提醒她成绩不是首要的，关键要有自觉、努力的态度。可她却不搭理我，还嫌我啰唆。

自那以后，我不敢招惹大闺女，只能默默关注。每次考试、作业或关键时刻，我都尽可能给予简单的赞美，如在群聊里发朵玫瑰，或当面说句“宝贝，你最棒”。

对于这些，大闺女要么一言不发地沉默，要么应付性地微微一笑。这让我的愁绪和牵挂陡增了不少。

但前些日子，我豁然开朗了，自信地认为我的小棉袄还是很懂事的。这种突破性的感觉源于一件小事的感恩表达。

稿、评论稿，倒是用了不少。那时全民评《水浒》，我写了《泥腿子也能评水浒》一文，被头条采用。第二天下田，有人跟队长说起，我们小队的知青写文章，县里广播了。后来公社挖大河，工地上红旗猎猎，让我去广播宣传稿，队长说快去，工分照记。下乡第三个年头，我的工分终于达到了正劳力。下乡的每一步，都是队长在扶着我，都是农民朋友在帮衬着。队长扶我走过的田埂，后来成了我丈量人生的标尺。今天，每每想起这些，我心里还是酸酸的，眼眶红红的。

队长姓潘，名小根，名字里带着时代的烙印。当年，农村很流行这种名字，像寿福、寿德、寿才等，听着朗朗上口，寓意很直白。生产小队分东西时，会计会直接报寿根家多少多少，寿才家多少多少，一听就明白。称呼人家家属就唤寿福家里的，寿德屋里的，根本不会用妻子、夫人等称呼，连老婆都不会叫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。我刚下乡那会儿，下田干活还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——当地有些农民脚，一只小腿细、一只小腿粗，大家称之为“大脚风”，队长就有这种病，但似乎不影响日常生活。这种病可能是现代医学所称的“丝虫病”，但我不确定。现在，农村卫生习惯大大改善，“大脚风”病早已绝迹。但当年看着队长的脚，我很是心疼。我还抚摸过队长的脚，问他痛不痛。队长爽朗地回答，不痛的，就是吃力的时候沉沉的。至今回想起那一幕，我心里说不出是酸还是痛。

4年的知青生活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的确是我人生中永难忘怀的岁月。4年里，我和队长朝夕相处，同耕一丘田，同吃一锅饭，同叙一腔情，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。随着当兵、招工的开始，知青点的青年陆续陆续地走了。高考也恢复了，但由于大家的学业荒废了，基本考不进大学，不过每个人在农村大学、社会大学里都学有所成。我也参加过高考，没考上，后来因为扩招来到当年的汽车技工学校（今浙江交通技师学院），成了一名交通人，与交通结缘一辈子。

离开生产小队已多年，其间我回去过几趟，但终没再见到队长。听老支书说，队长已仙逝，年纪不大，是脑出血走的，我心中很是惆怅。但见到村里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，环境面貌大变样，又多了几分欣喜。村里很难见到年轻人，说是大多搬到镇里、市里住了。外出的外出，经商的经商，进厂的进厂，每家每户都有营生，每个人都有去处。富起来，好事啊！

稻子黄了几十载，队长的家人我倒碰见过几回，他的女儿在城里开了家小炒店，儿子成了钣金厂的小老板，生活早已超过小康水平。但队长那粗壮的小腿、黝黑的皮肤和憨厚的笑容，却一直伴随着我，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重要支撑。昨夜骤雨漫过窗台，恍惚又见他在水田里倒退着插秧，新绿的秧苗列队站成工分簿上的数字，而赤脚踩出的泥窝窝，正“咕嘟咕嘟”往外冒着稻花香。

那一天，老婆出差去了，大闺女的洗头发问题难倒了我。大闺女见状直接说了句：“妈妈来不及的时候，都是带我去理发店弄的！”听到这句，我愧疚不已，自责自己只知道工作，孩子的事一点都不上心。随后，我跟着大闺女去了理发店。理发师热情地问我要不要剪发、洗头，我自嘲地回答：“头都快秃了，以后与你们理发行业无缘了！”简单的一句，让大闺女愣住了，下意识地自责起来。她满脸亏欠地说：“我爸爸很辛苦的！今天我才发现他的头发‘一下子’少了这么多，那就别理掉了吧！”

说完话，大闺女的眼眶湿润了，我不由得被打动了——让孩子的感恩之泪尽情地在我的心上流淌。事后，大闺女和我一起看了平生第一次“二人世界”的电影，我第一次正儿八经地听到了她的未来构想：“我会努力读书，会坚持跳舞，会用实际成果来报答爸爸……”

就这么不经意间，我再次被打动了。我怎么也想不出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多了一份“盼着你长大，又害怕你长大”的念想，多了一份“盼望你能做立枝头，又担心你会被风吹雨打”的遐思。我的大闺女，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。她跳舞时的旋转裙摆，总让我想起小时候握着她学步时掌心的温度。她的未来之路还很长，我的陪伴之路也很长。她的曾经让我看到了眼前的远方，她的今天让我读懂了未来的诗意。这也许就是父女之间的血液于水，是有言到无语、无声胜有声的亲亲情诠释。

昨夜替她整理书包，掉落出珍藏的幼儿园手工课作品：皱纹纸折的小物件水彩早已斑驳，那些被胶水封印的童真，突然剖开岁月的蜃壳。此刻，所有未及言说的牵念，都封存在这句话里：有你真好！